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誕生及其发展

迪·努·艾地著

世界知識出版社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的誕生及其发展

迪·努·艾地著
張　明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
1961年·北京

D. N. Aidit
LAHIRNJA PARTAI KOMUNIS INDONESIA
DAN PERKEMBANGANNJA
Jajasan "Pembaruan"
Djakarta, 1955
根据印度尼西亚"革新社"一九五五年版譯出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
的誕生及其发展

〔印度尼西亚〕迪·努·艾地著
强　朋　譯

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
(北京干面胡同27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证出字第101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定价0.12元

1955年12月第一版　1961年9月北京第三次印刷
印張$1\frac{3}{8}$·字数25,000
統一书号3003·232

印度尼西亚共產党成立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因此，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三日是印度尼西亚共產党成立三十五週年。

三十五年前印度尼西亚共產党的誕生，是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政党的誕生。这个党的發展是印度尼西亚工人階級領導農民和其他人民羣众進行反抗帝國主义及其走狗的英勇鬥爭及为了推翻反動政权並建立以大多數人民联盟即工農联盟为基礎的人民政权的鬥爭的歷史發展。唯有这样的人民政权，才有可能在未來实現社会主义的印度尼西亚。

印度尼西亚共產党三十五年的歷史，並不是平靜的与和平的歷史，而是經歷了許多動盪、許多危險、許多錯誤和許多犧牲的歷史。但也是英雄的、兴奋的、有許多教訓和成功的歷史。

印度尼西亚共產党三十五年來的發展可以劃分如下：

（一）党的成立和反抗第一次白色恐怖的鬥爭（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六年）。

（二）二十年地下鬥爭和反法西斯战綫（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五年）。

（三）八月革命和反抗第二次白色恐怖的鬥爭（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一年）。

（四）民族統一战綫的擴大和党的建設（一九五一年——……）。

(一)党的成立和反抗第一次白色恐怖的鬥爭
(一九二〇年——一九二六年)

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是印度尼西亞工人运動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相結合的產物。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在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成立並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客观的事件。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是在帝國主义時代，是在印度尼西亞有了工人階級，成立了工会及社会民主联盟以及在一九一七年俄國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之後誕生的。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是適時誕生的時代產兒。

斯大林在其所著的"論列寧主义基礎"一書中的說明使我們明瞭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誕生乃是時代的必然性：

"帝國主义就是对極廣闊殖民地和依賴國內十多万万居民施行最横蛮的剝削与最無人道的压迫。榨取額外利潤，就是这种剝削与压迫底目的。可是，帝國主义在剝削这些國家時，不得不在那裏敷設鉄路，設立工廠，建立工商業中心。無產者階級的出現，本地知識界的產生，民族意識的覚醒，解放运動的加强，就是这种'政策'不可避免的結果。所有一切而無例外的殖民地和依賴國革命运動之加强，就是顯明証明这一點。

"这个情况对於無產階級是重要的，因为这个情况根本破坏資本主义底陣地，把殖民地和依賴國由帝國主义底後备力量变为無產階級革命底後备力量"。

斯大林在上面所說的，是完全符合於二十世紀初期在印度尼西亞所發生的情况。由於二十世紀初期在印度尼西亞的投資的迅速增加，殖民資本不得不在印度尼西亞經济生活中实行巨大的改变。不得不建立原料加工工業如糖和橡膠工業。不得不

建築碼头、鉄路和修理廠。因此，虽然帝國主义努力保持封建關係，但也不能够防止資本主义傾向滲入到印度尼西亞民族中去。因此，印度尼西亞社会中出現了新的階級，其中包括無產階級。这形成了印度尼西亞独立鬥爭的新的基礎，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就是在这个新的基礎上成立的。沒有組織的和不断遭到失敗的農民暴動，現在已为有組織的並領導農民及其他革命階級的無產階級鬥爭所代替。

關於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誕生之前，先成立工会和"印度尼西亞社会民主联盟"这點，可作如下的敍述：一九〇五年成立了一个鉄路工会，名为"國家鉄路工会"。一九〇八年成立了"鉄路电車工会"，这是一个战鬥性的鉄路工会。但是，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的覺醒的提高，已經要求不僅僅局限於工会鬥爭的組織。一九一四年五月在三宝壠成立了"印度尼西亞社会民主联盟"，这是一个集合了印度尼西亞和荷蘭的革命知識分子，为了在印度尼西亞工人和人民中間傳播馬克思主义的政治組織。"印度尼西亞社会民主联盟"於一九二〇年五月二十三日改組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

關於一九一七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推動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成立，我只想引用毛澤东同志的話如下：

"十月革命一声砲响，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观作为觀察國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

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成立表明了印度尼西亞進步分子在迎接偉大的十月革命砲声並不落人後。換句話說，印度尼西亞進步分子和革命的印度尼西亞人民大众及時地加强了新的反对世界帝國主义的革命战綫。因此，爭取印度尼西亞独立的鬥爭成为了全世界無產階級粉碎資本主义的鬥爭的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

關於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人的任务，列寧在一九一九年十一月对东方各民族共產主义者的号召中，已經說清楚了。

列寧說："在你們面前擺着一个任务，这个任务从前在全世界共產党員面前是沒有提出过的，这个任务就是：依靠一般共產主义的理論和实踐，你們在应用於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独特条件時，須要善於把这个理論和实踐应用於这样的条件，即農民是主要羣众，所要解决的鬥爭任务不是反对資本而是反对中世紀的殘餘。"

列寧的这一号召說明了东方的共產主义者，也包括印度尼西亞的共產主义者，不僅必須依靠"一般共產主义的理論和实踐"，而且也要使自己適应於"歐洲各國所沒有的独特条件"，列寧在这裏所指的独特条件就是農民。

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是新的階級即必須担負起領導者的責任的工人階級的政党。为什麼工人階級必須担負領導者的責任呢？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虽然數量不多（約有六百万人是工資勞動者，其中約有五十万是現代工人或無產階級），但他与農民是有區別的，因为工人階級代表新的生產力；工人階級也不同於資產階級，因为工人階級拥有堅决的鬥爭意志，因为这一階級受到三种压迫，即帝國主义、封建主义和資本主义的压迫。由於它的工作場所，工人階級是最有紀律的階級，由於沒有生產資料，工人階級是最堅决的和大公無私的階級。因此，工人階級虽然數量不多，但必須担負領導的責任。

後來以反对荷蘭帝國主义的战鬥者而著称的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成立，不僅受到印度尼西亞工人和農民而且也受到其他人民階層的熱烈欢迎。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同样獲得軍隊和水兵羣众的欢迎。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發展得非常迅速。

不久，共產党人就在"工人运動联盟"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工人运動联盟"於一九二〇年八月在三宝壟召開代表大会，有二十二个工会代表参加，代表七万二千会員。共產党人首先是通过战鬥性的"鉄路电車工会"去發生影响。这是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在工人运動中的优良傳統的開始。

一九二〇年在爪哇和苏門答臘發生了各种罢工，这些罢工一般是以工人的勝利而結束。这些勝利給了工人以鬥爭精神和鼓舞；教育工人認識了組織和紀律的重要性，並向工人和一般人民揭露了殖民劳工条例和殖民政府的腐敗。

工人运動所獲得的進展，使政府感到恐懼，尤其使它恐懼的是，共產党的势力日益强大。政府設法去影响"回教联盟"，並加深共產党人和"回教联盟"之間的矛盾。在"工人运動联盟"內部的改良主义派獲得荷蘭政府的支持，因而加深了革命派和改良主义派之間的矛盾。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在日惹的哥達克特召開的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代表大会的記載称：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有三十八个党委，擁有一千一百四十个党員，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外圍組織"人民同盟"擁有四十六个分支、三万一千个盟員。

这証明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即使在荷蘭殖民政府的巨大阻碍之下仍獲得迅速的發展。"人民同盟"的迅速發展，顯示了農民对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熱烈欢迎，因为"人民同盟"的成員主要是農民。

但是，党並沒有能够鞏固羣众对党的廣泛的同情以及較多的党員人數。党雖曾在喚醒人民的反对荷蘭帝國主义的精神方面作了重要的工作，但是，党沒有能力來鞏固它所已經獲得的成就。

当時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領袖的基本錯誤，就是他們成了左

傾口号的犧牲品，不努力說明情況，企圖一举解決所有的問題，如消滅封建主义，擺脫荷蘭統治，粉碎所有的帝國主义者，打倒反動政府，消滅富農，消滅民族資產階級。自然的，这一切就導致眞正的敌人和可能成为敌人的分子团結起來反对党。这使党本身陷於孤立並大大地削弱了党。党沒有充分地引導其党員去關心同工人、農民及劳動知識分子的日常需要有關的細小和普遍的实际工作，其实只有在这裏，只有在这种工作中，党才能把廣大的劳動人民羣众团結在党的周圍。当然，这种工作並不是称心如意的，不是沒有困难的。但是，要密切党同劳動人民羣众的联系，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正如一九五四年三月，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第五次全國代表大会的總報告中所說的，在第一个時期，

"党对於联合民族資產階級的必要性还是完全無知，党提出的口号是'立即实現社会主义'、'印度尼西亞苏維埃'和'無產階級專政'。斯大林同志一九二五年五月十八日对东方大学学生的演說中正確地並中肯地批評了党的这种'左'傾偏向，他說：'这是"左"的偏向，它包含着与廣大羣众脫离並把共產党变成宗派的危險。'"

党犯上了共產主义运動中的"左"的毛病，这顯然已使党变成一个宗派，使党从廣大的人民羣众中孤立起來，並使殘酷的殖民政府容易來粉碎党。斯大林確切地說："与这个偏向作堅决的鬥爭，是东方殖民地和附屬國培养眞正革命幹部的必要条件。"斯大林同志以上的話的正確性，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後來的發展过程中，我們深深地体会到。

至於建党的工作，当時党的領導还不可能眞正地去注意它。党內沒有進行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教育，机会主义分子潛入並控制了党的領導机構，党还不懂得批評和自我批評以及集体

領導的方法。这个事实使党在理論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都很軟弱。

在党脫离羣众和党的組織还非常軟弱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亞的危机愈益加深，人民的生活日益降低，沒有組織起來的人民对政府工具進行的反抗也愈益加多。在这种情况之下，荷蘭殖民政府不断地進行挑衅，即解僱罢工者、逮捕農民、封閉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或"人民同盟"举办的学校，禁止工人的報紙出版、逮捕工人領袖等等。特別是为了对付農民，荷蘭組織了各种恐怖集团，如勃良安的"綠色同盟"。这一切導致了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在爪哇和一九二七年年初在苏門答臘的人民起义的爆發。起义爆發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即挺身而出，以便尽力領導起义。印度尼西亞共產党迅速出來領導这次人民起义的态度，乃是正確的。

起义進行期間以及起义之後，党的各种弱點即顯得特別突出。例如党的領導对於起义沒有一致的意見，对保衛党的領袖和幹部的工作毫無準备，各地方之間的行動沒有相互配合，城鄉之間的鬥爭沒有相互联系等等。除此之外，还有陈馬六甲这一類人（当時是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領袖之一），他在起义開始之前沒有採取明確的措施，而在起义爆發之後却責难起义不对。尤有甚者，正当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面对着殖民政府及其走狗的白色恐怖的時候，他和他的集团竟公開地实行了托洛茨基的作法，建立新的政党——"印度尼西亞共和党"。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內部的分裂使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原來已經困难的工作更加困难起來，而且便利於荷蘭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內部以及在一般的民族独立运動內部实現其分裂政策。

數以千計的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党員和工作人員被追逐和判刑，其中有的被絞死。有許多人被流放到伊里安利亭的沼澤地

帶。只有幾个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領袖能够安全地逃往國外，其中有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中央委員会委員慕棱同志。

許多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党員和工作人員，虽然他們參加党的時間並不長，但其中大多數都具有强的党性。他們毫不後悔，含笑地走向絞架与接受監禁或流放的判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堅決反对荷蘭帝國主义的政策以及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党員与工作人員面对当時的殖民政府所表現的英勇态度，提高了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在眞正爭取独立的战士和印度尼西亞人民中間的政治威信。这使印度尼西亞被压迫的人民增加了对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信仰和愛戴。

一九二六年的起义，以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和革命的印度尼西亞人民的失敗而告結束。但是，有一件事情是不能够被忘却的，这就是这次起义向印度尼西亞人民指出了：荷蘭是可以被弄得手足無措的，殖民統治是可以被搖撼的，这种統治不是千古不变的統治。因此，一九二六年起义对於提高印度尼西亞人民的政治覚悟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

由上述种种得出的結論是：印度尼西亞共產党还不善於將馬克思列寧主义的一般原理和印度尼西亞革命实踐結合起來，因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領導还沒有掌握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还沒有了解印度尼西亞的歷史和社会情况以及印度尼西亞革命的特點和印度尼西亞革命的規律。其結果便是：党不懂得印度尼西亞人民客观的基本要求，即消滅帝國主义和封建主义並实現民族独立、民主和自由的要求。此外，党的領導沒有認識到，为了实現上述要求，就必須建立以工人階級为領導、以工農联盟为基礎包括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城市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在內的廣泛的統一战綫。由於不了解这一切問題，当時党的領導就產生了錯誤的想法，以为"農民在一切鬥爭中是不能

被信任的"，以为"中間階層和知識分子已經成为資本家的工具"，以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必須反对一切資本主义"，以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口号是"立即实行社会主义"、"建立印度尼西亞苏維埃"、"实行無產階級專政"等等。

虽然，在这个時期中，党的組織是發展了，但沒有把党鞏固起來。党員和党的幹部在理論和政治方面沒有加强，他們沒有獲得必要的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教育。沒有能够使党內積極分子成为党的骨幹。在面对着第一次挑衅和白色恐怖的危急情况下，在党的領導中掌握实权的分子未能領導全党來挽救党。

總而言之，在第一个時期中，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在兩个基本問題上沒有經驗，即：(一)統一战綫問題，和(二)建党問題。

(二)二十年地下鬥爭和反法西斯战綫
(一九二六年——一九四五年)

一九二六年起义之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便被荷蘭殖民政府宣佈为非法。鑒於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不能够再从事合法工作，又由於它被左的口号所吸引，因此，原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領導下的革命羣众便轉而欢迎左翼民族主义政党，即在一九二七年成立的"印度尼西亞國民党"。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幹部和党員除了参加各种羣众团体外，还有許多参加了这个左翼政党。但是，由於印度尼西亞共產党还沒有建立新的中央領導，当時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幹部和党員的活動沒有獲得良好的領導。

自从一九二六年起义失敗以後，印度尼西亞的民族独立运動開始進入低潮。顯然，荷蘭殖民政府不僅鎮压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以及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領導下的革命的羣众組織，而且

以实行各种挑衅、阻撓它的一切活動和流放它的領袖等措施來鎮压"印度尼西亞國民党"。

当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和左翼民族政党被殖民政府打擊的時候，在"印度尼西亞民族党"內拥有基本力量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便趁机加强他們和荷蘭政府的合作。他們集中力量从事他們所謂"積極的"工作，即指建立合作社，学校，商会等等。在一定程度上，右翼民族主义者在若干地區甚至在鄉村中擴展了他們的工作。荷蘭樂於称他們为"健康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們的活動和荷蘭政府的利益沒有衝突，也正因此，荷蘭政府給予他們以必要的方便。

但是，独立运動的低潮为時不長。世界危机及隨之而來的廣大人民的貧困、緊縮開支、增稅、集体解雇等等，阻碍了右翼民族主义者和荷蘭政府間的穩当的合作。來自工人階級、農民和知識分子的急進的呼声越來越响亮。这个危机時期通称为"不景气時期"，或如印度尼西亞農民所称的"困难時期"。

在一九三三年二月間，猶如晴天霹靂，在"七省号"軍艦上發生了水兵暴動，这个暴動受到許多國家的工人的熱烈欢呼。这一事件对於重新鼓舞印度尼西亞人民反抗荷蘭殖民統治的精神是重要的。後來在一九三三年的七月，爪哇鉄路工人威脅罢工，荷蘭政府在印度尼西亞改良主义分子的帮助下好容易才阻止了它的爆發。

在各个地區發生了人民的反抗鬥爭，大多數是个人的活動，这証明反抗的鬥志在增長着。但由於印度尼西亞共產党还未能良好地重建其中央領導，使荷蘭对工人階級的鬥爭和人民的反抗的鎮压顯得輕而易举。

自从一九三二年以來，从事地下工作的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以十八条綱領为其行動的基礎，即，印度尼西亞完全独立，立即

釋放所有政治犯並取消利寡集中营，保障罢工权利和示威遊行权利，同工同酬，反对各种降低工資的措施，由政府救济失業者，土地歸農民並沒收帝國主义者、地主和高利貸者的土地，反对新的帝國主义战爭，等等。这个綱領是在法西斯分子（國家社会主义者）在德國当权之前制訂的。

在一九三三年三月間，德國法西斯分子在希特勒領導下登台。斯大林同志在联共（布）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指出法西斯主义在德國的勝利時說：

“……不僅要把法西斯主义在德國的勝利看作是工人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看作是替法西斯主义当清道夫的社会民主党叛变工人階級的結果。同時还須把它看作是資產階級力量軟弱的表現，它表明資產階級已不能用國会制的和資產階級民主制的舊方法來实行統治，所以不得不在对內政策上採取恐怖的管理方法；它表明資產階級已不能用和平对外政策來找到擺脫現狀的出路，所以不得不採用战爭的政策。”

換言之，为了对付深重的經济危机，为了对付尖銳化的資本主义總危机和更加革命化的劳動人民羣众，执政的資產階級便向法西斯主义尋求保護。

帝國主义者利用法西斯主义把全部危机的負担轉嫁到劳動人民肩上。他們奴役弱小民族、加緊殖民压迫以及發動新战爭來重新瓜分世界，力圖以此來解決市場問題。他們摧殘工人和農民的革命运動，並向世界無產階級堡壘苏联發動軍事進攻，想以此來阻撓革命力量的成長。

季米特洛夫同志在一九三五年八月共產國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的演說中提到：“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不僅只是資產階級的民族主义。这是野蛮殘忍的民族侵略主义。这是強盜政治的政体，它誣害和拷打工人階級以及革命的農民、小資產階級和知

識分子。这是中世紀的暴虐無道的野蛮制度。这是逞性侵略其他民族及國家的制度。”

由於法西斯分子在德國的当政所引起的國际形势的变化，对印度尼西亞政局的影响是重大的。苏联把鬥爭首先指向建立和平陣綫，以反对侵略國家。一九三五年八月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际代表大会上也通过了一項綱領，目的是在工人运動中建立統一战綫，建立人民陣綫和人民政府，以反对战爭和法西斯主义。这就意味着在共產党人和民主的資產階級分子之間实行更廣泛的合作的必要性。

为了傳達这个反法西斯的政治路綫，慕梭同志於一九三五年从國外返回印度尼西亞。慕梭同志不僅僅傳達这个新的政治路綫，他同時成功地重新把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幹部聚集起來，並建立了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新的中央委員会。但是，慕梭同志在印度尼西亞不能久留，他必須立即再度离開印度尼亞西，因为荷蘭政府已經發覚了他的行踪。这样一來，慕梭同志沒有机会为党的建設作很多工作，以致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領導必須在沒有强有力的方針的条件下來建立列寧—斯大林型的党。

在若干左翼民族主义者和若干共產党人的倡議下，成立了合法的人民团体，称为“印度尼西亞人民运動党”。“印度尼西亞人民运動党”的成立，給予民族独立鬥爭和反法西斯运動以新的力量。在“印度尼西亞人民运動党”及其他民主政党的建議下，組成了“印度尼西亞政治联盟”，也就是为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議会，並和荷蘭政府商議共同反抗法西斯主义、首先是威脅亞洲人民的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各个党派的統一战綫。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印度尼西亞政治联盟”在雅加達召開印度尼西亞人民代表大会，非政党的組織如工会、社会团体等也出席了这个大会，在該代表大会上議会問題

成为首要的議程。在印度尼西亞建立議会被代表大会視为重要問題，作为在对付法西斯主义危險中鼓舞人民力量的对策。後來，該代表大会的領導者決定將印度尼西亞人民代表大会改为被認为代表印度尼西亞全体人民的印度尼西亞人民会議。这是成立一个議会的準备。但是，荷蘭政府对这一事实置之不理。"印度尼西亞政治联盟"和印度尼西亞人民会議向荷蘭提出合作以对付日本法西斯的侵犯的提議，到了一九四二年三月九日荷蘭投降日本为止，一直不被荷蘭所理睬。

沒有獲得廣大人民羣众的支持的各政党与团体的領袖之間的廣泛合作，已使爭取設立議会的要求遭到失敗，已使压迫荷蘭政府積極与印度尼西亞人民一道進行反法西斯鬥爭的印度尼西亞人民运動遭到失敗。这是因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还沒有形成为一个在羣众中生根的能够团結和動員廣大人民羣众，首先是工人和農民的政党。"印度尼西亞政治联盟"和"印度尼西亞人民代表会議"作出各項決議但从未發動羣众鬥爭如示威遊行或其他鬥爭來配合，作为对荷蘭殖民政府施加的有意义的压力。

由於在印度尼西亞的反法西斯陣綫不够强大，所以日本軍隊能够沒有遭到抵抗而佔領印度尼西亞，不僅沒有遭到荷蘭軍隊的抵抗，而且也沒有遭到人民运動的抵抗。在面臨日本法西斯時，人民不論是物質上或精神上的準备都不够。其結果是，在抵抗日本法西斯的初期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处於孤立的地位。在日本佔領初期，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中央委員会的委員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重要幹部有許多被日本逮捕，其中也有被处死刑的。

在日本佔領之後數个月，印度尼西亞人民根据本身的經驗才認識到日本法西斯的殘暴与獸行。在人民中間，反对日本的情緒越來越普遍，反法西斯的組織在各地成長起來，而且有許多

是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党員和幹部的領導下。当時，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在日本暗探追緝之下过生活的。日本对共產党人的追捕是一刻也沒有停止过。由於組織不嚴密，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重要幹部經常为日本所逮捕。但是，即使如此，日本的殘暴也不能压下人民的反抗。到处發生暴動，如新雅巴那、南安由与三宝壟等地，而且在“保衛祖國軍”中間也發生暴動，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諫义里州勿里達的“保衛祖國軍”的暴動。

關於日本佔領印度尼西亞之前和之後的反法西斯陣綫的問題，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第五次全國代表大会的總報告中曾这样說：

“反法西斯陣綫（日本佔領之前——迪·努·艾地）不僅成功地吸引了民族資產階級，而且也吸引了部分的買办資產階級成为反日陣綫的後备力量。但是，自从日本軍隊佔領印度尼西亞之後，大部分民族資產階級以及可以說整个買办資產階級採取了与日本合作的政策。民族資產階級当看到人民反日力量不怎麼强大之後，並幻想日本將給印度尼西亞以‘独立’，他們便实行与日本合作的政策。”

但是由於反日情緒高漲，特別是在農民与軍隊的暴動事件發生之後，日本的走狗对其主子効忠的程度就越來越減退。最後，有不少高踞要職的人士与地下的反日运動發生联系。印度尼西亞的大學生和学生在反抗日本的鬥爭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这一切的結論是，虽然人民的反日和反荷情緒高漲，虽然由於党执行堅定的反法西斯政策而享有很高的政治威信，虽然國內外的形势对於發動革命非常有利，但是党所面对的一九四五年八月爆發的革命的任务是非常繁重的，因为党沒有把它在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的關於統一战綫的經驗總結起來，而且在建

党的問題上仍然是沒有經驗的。此外，党也沒有武裝鬥爭的經驗，而这一經驗对於一个处在革命中的党是非常需要的。

(三)八月革命和反抗第二次白色恐怖的鬥爭(一九四五年——一九五一年)

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在八月革命中所处的情况是这样的，即尚未總結有關統一战綫的經驗，在建党問題上仍然沒有經驗而且也沒有武裝鬥爭的經驗。

在羣众及其代言人即年輕的革命領袖，其中也有在日本佔領期間領導地下組織的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党員的压力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宣佈成立了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七日独立宣言是体現了印度尼西亞人民在三个多世紀荷蘭統治下从未熄滅过的以及在日本佔領期間日益高漲的要求独立的願望。

印度尼西亞的工人、農民、進步的青年和学生在学習歐洲許多國家在法西斯軍隊被擊潰之後从帝國主义統治下解放自己的範例以及受到中國人民偉大的解放鬥爭的鼓舞，認識到發動一个已为歷史所規定的革命的可能性。在宣佈独立宣言时，除了已經遭到失敗的日本軍隊以外，在印度尼西亞(西伊里安除外)沒有其他的軍隊。这种良好的形势已为印度尼西亞人民正確地利用了。

工人、農民、進步的青年和学生堅決保衛印度尼西亞共和國，他們最初抵抗日本軍隊，接着抵抗英國軍隊，在兩次殖民战爭中抵抗荷蘭軍隊。

虽然印度尼西亞人民的这一鬥爭使愛國者流了許多鮮血，虽然荷蘭帝國主义曾進行了种种旨在粉碎共和國的軍事進攻，

但是共和國仍屹立不動。

荷蘭僅僅在使用英國和美國顧問以及它在印度尼西亞人中間的走狗的帮助下，通过長远的途徑，“和平談判”的途徑，通过陰謀和挑撥，通过在大砲和炸彈的威脅下簽定有利於帝國主义的协定才能在削弱共和國的勾当中獲得成功。

自革命初期即已控制着政权的、以沙里尔为首的右翼社会党人，在执行在大砲和炸彈威脅下的“和平談判”的政策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它之所以有可能，是因为印度尼西亞人民，受了長期的殖民地压迫，不可能拥有一个能够充分掌握馬克思、恩格斯、列寧和斯大林的革命学說的隊伍。

八月革命乃是民族統一战綫的革命，主要的打擊是集中在和針对着外國帝國主义，民族資產階級也給革命以支持。

關於革命期間（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八年）的民族統一战綫的問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第五次全國代表大会的總報告中曾这样說：

“民族資產階級当看到人民革命力量强大之後，便重新参加到民族統一战綫中來。具有强大力量的人民革命使民族資產階級在革命初期的幾年中抱有堅强的态度。”

但，總報告接着說：“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軟弱使党沒有能力对当時非常好的客观情況進行領導。”

關於党与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總報告說：

“在这一革命中，党已拋棄了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的独立性，並且党沒有重視農民中間的工作，这就是革命失敗的基本原因。对革命的領導的軟弱使得革命在軍事、政治、經济等方面不断地遭受到失敗，这些失敗使民族資產階級動搖起來，而他們終於投到買办分子和帝國主义方面去。一九四八年八月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代表会議通过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新道路’的決

議，是当時处於困境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出路。但是，在执行这个决議之前，哈達—苏基曼—納席尔政府發動了茉莉芬的挑衅事件。”

一个極其有利的情况是：在革命初期，可以从澳洲和歐洲寄來有關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書籍。但是，这些理論書籍都是外文版，主要是英文版与荷文版，因此能够学習这些理論書籍的幹部非常有限。当時掌握党的領導的分子，对於把理論書籍譯成印度尼西亞文的工作的注意是非常不够的。虽然如此，但这些理論書籍已經有可能使有机会自学这些書籍的党的幹部中間產生党的骨幹。虽然人數还不可能多，但这却是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第一次有可能从自已的隊伍中產生有理論修养的骨幹，而这是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繼續發展的重要保証之一。

革命期間，党拥有武裝力量，但党沒有能力掌握它。党的幹部非正規地学習軍事科学与革命战爭的科学。數度在政府中担任國防部長的阿米尔·沙利佛丁同志学習中國人民的革命战爭，他为了这种思想，即游擊战爭是取得革命勝利的一种正確的鬥爭形式的思想能取得勝利而進行了鬥爭。阿米尔·沙利佛丁同志必須進行堅决的鬥爭來反对那些軍事領導人的輕視游擊战爭的思想。一方面阿米尔·沙利佛丁同志成功地使他的思想取得勝利，但是在另一方面，他的思想的实現遭到各种阻碍，因为受到那些輕視游擊战爭的人的反对，因为缺乏有素养的軍事幹部以及因为沒有正確的統一战綫政策和建党政策而造成的困难。

党当時在学習中國革命中所犯的基本錯誤之一，就是党僅僅致力於了解中國革命与印度尼西亞革命之間的共同點，但沒有致力於了解其不同點，沒有看到印度尼西亞的特殊条件。

根据中國的經驗，对於像印度尼西亞这样一个落後國家來

説，游擊战争、建立游擊解放區並在这些地區組織人民解放軍，乃是爭取完全的民族独立的正確鬥爭形式之一。但是这种鬥爭形式在印度尼西亞沒有像中國那样獲得巨大的可能性。这是由於印度尼西亞的特殊条件所致。

游擊战爭的最有利条件，乃是廣闊的地區、廣闊的山區与森林區以及远离城市与交通綫的地區。印度尼西亞的情况僅僅具备这些条件的一部分。

提出以上事实是否意味着游擊战爭在印度尼西亞就行不通了呢？完全不是这样。但是，为了使游擊战爭的方法在印度尼西亞現有的条件下能取得更大的效果，我們应該設法使游擊战爭的方法与敌人佔領的城市的工人的革命运動以及与經济和政治總罢工鬥爭結合起來。在印度尼西亞这样的条件下，所有的交通运輸部門即鉄路、汽車、航海、航空等部門的工人的罢工是具有特殊的意义的，因为無產階級在这些部門的總罢工是可以大大地削弱革命的敌人，从而給予游擊鬥爭以有力的援助。八月革命時期，共產党人非常不重視在荷蘭佔領區組織工人和領導工人鬥爭的工作。

除此之外，八月革命時期，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沒有在荷蘭武裝力量中間進行有效的工作，在这些武裝力量中間有不少是農民与工人的子弟，他們是可以被爭取到革命方面來的。其实在敌人武裝力量中間進行有效的革命工作是可以大大地削弱敌人的力量的，而且这是意味着对游擊鬥爭的重要援助。

因此，八月革命時期的游擊战爭是可以加以擴大並鞏固起來的，如果当時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基於下述三种鬥爭形式的結合來解决这个問題的話。这三种鬥爭形式是農村的游擊鬥爭（主要的成員是農民）、荷蘭佔領的城市中的工人革命鬥爭以及在荷蘭武裝力量中進行的有效的工作。

武装鬥爭的失败与武装力量内部革命精神的鬆懈，經常是導致統一战綫与建党工作的後退。当武装力量的若干部分，在反動分子操縱下，反对工人与農民运動以後，八月革命失败的跡象也就暴露出來了。

在八月革命快要失败的情况下，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在其一九四八年八月会議上，根据慕梭同志的建議，通过了一項名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新道路”的决議，作为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擺脫当時所面对的艰难处境的出路。

“新道路”的决議提醒了党的最重要的，但在八月革命期間被忽視或完全沒有执行的任务：

關於統一战綫，該决議指出，在革命期間“共產党人忽視了建立一个作为反帝民族革命的武器的民族战綫。虽然後來他們開始認識到这一民族战綫的重要性，但共產党人尚未眞正了解民族統一战綫的实質以及建立民族統一战綫的方法。三年來建立了若干种類的民族战綫，但是經常全是停留在紙面上，这只是各团体或領袖之間的协商会議。如果这一民族战綫各領袖間發生一些糾紛，就使这一民族战綫瓦解。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確信，目前工人階級政党不能單独完成这个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因此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必須和其他党派合作。共產党人必定要努力团結其他党派与团体的成員。这种团結唯一的形式就是民族战綫。”

關於共產党人在建立民族战綫中必須採取主動的問題，該决議說，这种主動性“絕对不是說：共產党人强迫其他党派或人們來參加，相反的，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必須耐心地使誠实的人們相信：獲得勝利的唯一道路，就是建立为所有進步的与反帝的人民所支持的民族战綫。每一位共產党人必須確信，沒有民族战綫，勝利就不会到來。”

關於武裝鬥爭，"新道路"的决議說，必須特別重視这种鬥爭。武裝鬥爭必須予以特別的重視，因为荷蘭帝國主义繼續不斷地致力於加强其軍事力量。决議接着又說："軍隊是最重要的國家政权工具，必須加以特別注意。軍隊的幹部与成員必須給予符合於軍隊任务的，即軍隊是保衛我國民族革命亦即保衛劳動人民利益的最重要的工具的特別教育。軍隊必須与人民团結並为人民所熱爱。軍隊必須由進步的幹部來領導。自然，首先必須在軍隊的幹部中間把反動的与反革命的分子清洗出去。"

該决議批評了由於忽視給予一般劳動人民（工人与國家公务員），特別是軍隊和國家警察人員的生活以保障，因此使得他們的生活無人照顧。

關於党，該决議說，共產党人的基本錯誤，乃是縮小了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作为工人階級在進行革命中必須掌握領導权的唯一的力量的作用。針对这个錯誤，"新道路"的决議說，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决定建議："三个承認馬克思列寧主义原則的（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社会党与印度尼西亞劳工党——迪·努·艾地）、目前联合在人民民主陣綫內的、並根据共同綱領採取联合行動的政党从速合併成为一个工人階級的政党，該政党仍採用歷史性的名称即印度尼西亞共產党，……"

由於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支持以苏丹·沙里尔为首的右翼社会党人的反動政策，"新道路"的决議說，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因支持右翼社会党人的政策，就犯了兩种錯誤：

第一个錯誤是，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沒有領会革命理論的教導，即："現代反帝民族革命已經成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印度尼西亞民族革命必須与世界其他的反帝力量，即全世界的，不論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或資本主义國家的革命鬥爭緊密地联系起來……。"

第二个錯誤是，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沒有充分認識到，在苏联非常迅速地成功地解放整个东北（滿洲）之後，苏联与英美帝國主义之間的力量对比。当時，已經很明顯，苏联在亞洲大陸上的地位是非常强固的，它牽制着英國、美國和澳大利亞帝國主义的大量兵力，从而給印度尼西亞人民以良好机会來發動革命。当時，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人却过高估計了荷蘭及其他帝國主义的力量，而过低估計了印度尼西亞革命和其他反帝陣营的力量。"

上述決議說明，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已改变其政策，即明確地廢除"林牙椰蒂协定"和"倫維尔协定"，它們实际上已成为各領袖和人民大众之間的各种混乱的根源。拒絕"林牙椰蒂协定"和"倫維尔协定"也意味着在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方面進行嚴厲的自我批評。

上述決議總結說，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在八月革命中的原則性錯誤，是由於党在思想上的薄弱所致。因此決定党員必須学習馬克思列寧主义。每一个共產党人有責任閱讀和学習革命理論，並有責任在工人与農民中間举办訓練班，以便用这种办法使他們能够經常將理論与实踐密切联系起來。不与羣众結合的理論，不能够形成力量；但是相反地，与羣众密切結合的理論就能够形成極为巨大的力量。

这样一來，"新道路"的決議給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在統一戰綫、武裝鬥爭和党的建設等方面的更良好的工作奠定了基礎。"新道路"的決議对党內外的机会主义是無情的懲罰。它是拯救正在危險中的印度尼西亞革命的重要的步驟，而且是建立列寧斯大林型的党的首要步驟。

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新政策已經有可能使印度尼西亞革命新的高潮的到來。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召開來闡明印度尼西亞共

產党新綱領的羣众大会，有數万以至數十万人参加。羣众熱烈欢迎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提出的繼續進行独立战爭來反对荷蘭帝國主义的号召。当時执政的反動政府的假面具開始在羣众面前被揭穿。羣众開始理解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所指出的新道路是贏得革命勝利的唯一道路。

由於害怕印度尼西亞革命的新的高潮，荷蘭和美國帝國主义及充当其走狗的印度尼西亞人加緊它們的活動並確定步驟，以粉碎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領導下的独立运動。

一九四八年八月底，在梭罗發生各种挑衅事件，後來在若干其他地方也發生这样的事件。革命的軍官被卑怯地殺害。各个工会和印度尼西亞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办公地方为某方的部隊所强佔。

一九四八年九月中旬，在茉莉芬發生了贊同当時政府的反動和挑衅政策的軍隊集団与堅決忠实於革命的軍隊集团之間的衝突事件。这次事件是政府煽動起來的，它說，在茉莉芬發生共產党人夺取政权和共產党人建立苏維埃國家的事件。政府根据这种虛構的理由号召所有的國家工具來追捕和殺害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党員及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同情者。这样就爆發了第二次白色恐怖，这是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荷蘭政府白色恐怖的翻版。但是，第二次比第一次更殘酷。在这种情况下，共產党人除了拿起武器並以全力实行自衛，反对猖狂的白色恐怖之外，別的道路是沒有的。

"茉莉芬挑衅事件"是一九四八年十二月發生的新的荷蘭殖民战爭的一种準备，而这一切又是强迫印度尼西亞向荷蘭帝國主义作進一步的投降的準备。果然，不久便与荷蘭实行停战，隨後在荷蘭举行了圓桌会議。

在一九四八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的反荷战爭期間，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幹部和党員，站在最前列英勇地參加保衛印度尼西亞共和國。这一事实使人民看清楚了在"茉莉芬事件"期間反動派对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所進行的汚衊的虛偽性。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反对荷蘭軍隊的堅决鬥爭提高了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政策在人民中間的威信，这就使政府不可能宣佈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非法。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日印度尼西亞与荷蘭王國簽訂了賣國的"圓桌会議協定"。在談判期間，美國把馬尔勒·柯契蘭安置在荷蘭，作为專門对双方發出指示的人物。

關於"茉莉芬挑衅事件"(一九四八年)至馬斯友美党政府即苏基曼內閣下台(一九五一年)期間的統一战綫的情况，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總報告中說道：

"民族資產階級脫离了反帝民族統一战綫而投到挑起'茉莉芬事件'的哈達—苏基曼—納席尔方面去的時期。民族資產階級跟着投降了帝國主义，贊同了……賣國的'圓桌会議協定'。民族資產階級脫离民族統一战綫的政策，使党感到異常困难，因为党，由於它在農民方面的工作很弱，尙不能依靠農民。这种情况迫使党採取爭取時間以便重新吸引民族資產階級參加到反帝民族統一战綫中來，以及改善和加强党在農民中間的工作的策略。党的这种策略的正確性已为一九五二年開始的國內政治的新的發展所証明。"

上述一切所得的結論是：

八月革命(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已經遭到失敗，因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在面臨这次革命時还沒有總結出它在統一战綫問題上的經驗，而且在武裝鬥爭問題和党的建設問題上沒有經驗。

这次革命虽然失败，但是它已使印度尼西亚共產党取得了統一战綫的經驗。这次革命給予印度尼西亚共產党以重要的經驗，即關於民族資產階級的動搖性的經驗：在一定情况下，它能够参加革命及採取坚决的态度，站在革命方面；但是，在別种情况下，它会動搖和叛变。因此，無產階級和印度尼西亚共產党必須一貫地不断地爭取民族資產階級到革命方面來，但也必須防备他們背叛革命的可能性。印度尼西亚民族資產階級的兩面性大大地影响党的政治路綫和党的建設。党的進展或後退以及革命的進展或後退在很大程度上是有賴於党与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相反地，党与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党的進展或後退以及革命的進展或後退。

在与民族資產階級联合的过程中，党不可以放棄其独立性，並且不可忽視最可靠的、为數最多的同盟者，即農民。

这个革命也已經使印度尼西亚共產党取得關於党的建設問題的經驗，使印度尼西亚共產党的幹部更了解印度尼西亚社会情況、印度尼西亚革命的特點和規律，使印度尼西亚共產党的幹部有可能來学習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並学習把馬克思列寧主义的理論与印度尼西亚革命的实踐結合起來。

在革命中，武裝鬥爭是最重要的鬥爭形式，这也是一个經驗。党的發展，除了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統一战綫之外，也在很大程度上有賴於武裝鬥爭。武裝鬥爭的進展与後退对統一战綫和党的進展与後退是很有影响的。

“新道路”这一决議已經總結了革命時期的經驗，虽然是不完整。“新道路”这一决議是为建設一个全國範圍的、与羣众有密切联系的、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組織上鞏固的布尔什維克化的共產党的第一个重要步驟。

“茉莉芬事件”已經使印度尼西亚共產党的幹部和党員們更

警惕和更有战鬥性。

(四)民族統一战綫的擴大和党的建設
(一九五一年——……)

这个時期始自成功地起草了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党章的一九五一年四月的中央委員会全体会議。这个党章草案發到各下級組織之後,就引起了党內的廣泛討論。不等代表大会的批准,全党就已一致表示願意用这个党章草案作为日常建党活動的準則,而在执行这个党章过程中所取得的实际經驗,將当作制訂修正案的材料。

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党章的討論和实施大大地推動了党的發展,提高了党員的政治水平,活躍了党內民主,活躍了党內的批評与自我批評,加强了党的紀律、思想和力量的統一。党開始了解並開始实現共兩个基本任务,即:建立統一战綫的任务和建設党的任务。这一切都是在苏基曼(馬斯友美党)政府的統治下進行的。

由於意識到來自正在成長的革命人民运動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咄咄逼人的危險,由於看到"茉莉芬事件"事实上並沒有能"絞死"革命运動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外國帝國主义分子和國內反動派就瘋狂起來並再度製造陰謀,以消滅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現在不是在梭罗或茉莉芬發動挑衅事件,而是对丹絨不碌的警察站進行"襲擊",苏基曼政府就把它宣佈为"共產党的襲擊"。大約兩千名共產党人和其他進步人士被逮捕並被關進監獄裏。但是由於人民的压力,坐了幾个月監牢以後,全部都被释放出來,沒有一个人能被送去法庭審判。苏基曼(馬斯友美党)及其"八月大逮捕"的失敗,表明印度尼西亞的革命运動已經重

新兴起並且有了力量。

还在"八月大逮捕"的形势下，即一九五二年初，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就召開了全國代表会議，深入討論对苏基曼政府的政策。代表会議决定必須通过建立廣泛的反苏基曼政府戰綫及通过努力爭取民族資產階級，來推翻苏基曼政府。關於当時在西爪哇和中爪哇大規模地進行恐怖活動的"回教國运動"—"印度尼西亞回教軍"集団，代表会議認为这些集団是帝國主义分子和國內反動派的工具，其目的是要把人民革命运動夾在城市的与農村的反動力量之間，从而使反動派能够粉碎革命运動並完全統治全國。代表会議決定要動員党的全部力量，並与國家工具和其他民主政党团体一道，共同粉碎"回教國运動"—"印度尼西亞回教軍"恐怖集団。除此以外，代表会議通过了各項重要决定來鞏固党的思想和組織。为了使实現党当時的这一繁重而困难的任务成为可能，代表会議决定發展党員。

由於民主的人民运動繼續不断的压力，由於民族資產階級的日益左傾以及國內統治集団間的矛盾的結果，苏基曼政府終於被迫下台，並於一九五二年四月一日成立了韋洛坡（印度尼西亞國民党）政府，它的政策的進步方面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所支持。在韋洛坡內閣中也有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亞社会党的部長。由於反人民措施，一切民主力量，包括印度尼西亞國民党自己在內，推翻了韋洛坡內閣。在人民的更強大的压力之下，一九五三年七月三十日成立了沒有馬斯友美党和印度尼西亞社会党在內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印度尼西亞國民党）政府。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支持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的政策的進步方面。

其政策有進步的方面並为工人階級和人民大众所支持的政府的成立，証明了印度尼西亞革命运動高潮的出現。这表明民

族力量，包括民族資產階級在內，在面对國內外反動力量当中的日益团结。在这种情况下，在一定限度內，革命运動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是能够發展的。

在这个革命运動的高潮中，一九五三年十月召開了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中央委員会全体会議，作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第五次全國代表大会的準备。在这次全体会議中提出了修改党章草案的修正案，起草了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綱領草案、向代表大会作的總報告及对陈犇如主义的决議。陈犇如主义是要把党的政治和組織路綫恢復到"新道路"决議以前的情况的党內机会主义思潮。这次中央委員会全体会議歸納了提到代表大会的建議，以解决印度尼西亞革命的所有重要和基本的問題。

一九五四年三月召開了歷史性的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第五次全國代表大会，其目的是解决印度尼西亞革命的所有重要和基本的問題，改善党在建立統一战綫方面的工作，解决党的建設的所有基本問題，並密切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与羣众的联系。在这个代表大会上批准了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央委員会全体会議所起草的所有文件。此外，还批准了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競选宣言並决定發展党員和党組織。

在分析印度尼西亞的社会情况之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綱領中確定了目前印度尼西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關於这點，綱領提到：

"如果印度尼西亞的情况还是繼續不变，就是說，在帝國主义的統治沒有被推翻，封建主义的殘餘沒有被消滅以前，印度尼西亞人民就不可能使自己从貧窮、落後、不合理的情况中解放出來，就沒有力量对付帝國主义。当我國的政权仍然掌握在与外國資本密切勾結着的地主和買办的手中的時候，在印度尼西亞的帝國主义統治和封建殘餘就不会被消滅，因为他們要在我國

保留帝國主义的压迫和封建殘餘，因为他們最害怕印度尼西亞人民。”

“如果印度尼西亞要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变成一个独立的、民主的、繁荣的和先進的國家，最基本的問題就在於改变封建主和買办的政府，建立一个人民的政府，即人民民主政府。”

關於人民政府，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綱領中説：

这个政府“將是一个在工人階級領導下，以工農联盟为基礎的民族統一战綫的政府。鑒於我國經济的落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認为这一政府不应是無產階級專政的政府，而应是一个人民專政的政府。这一政府不应实現社会主义改革而应实現民主改革。它將是一个能够团結一切反封建和反帝力量、能够將土地無代價地交給農民、能够保証人民的民主权利的政府；它將是一个能够保護民族工商業免受外國競爭、能够提高工人的物質生活水平並消滅失業的政府。總之，它將是一个能够通过民主与進步的道路來保証民族独立和發展的政府”。

但是，擺脫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情况的出路和建立人民政府的道路何在呢？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綱領回答道：

“出路在於改变帝國主义者、地主階級、買办資產階級和人民之間的力量对比。出路在於喚醒、動員和組織羣众，首先是工人和農民羣众。”

關於工人在改变这一力量对比中的作用，綱領説：

“工人階級必須領導全体人民的鬥爭。为此目的，工人階級本身必須提高其積極性，教育自己，使自己成为一支强大的和有覺悟的力量。工人階級不僅必須为改善本身的生活水平而進行鬥爭，而且也必須將自己的任务提高到更廣泛的和更高的水平。它必須帮助其他階級的鬥爭。工人階級必須帮助農民要求土地

的鬥爭，帮助知識分子爭取基本权利的鬥爭，帮助民族資產階級反对外國競爭的鬥爭，帮助全印度尼西亞人民爭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鬥爭。只有当印度尼西亞工人階級成为一个独立的、覚悟的、政治上成熟的、有組織的、並能够領導全体人民的鬥爭的力量，只有当人民把工人階級看做是自己的領袖的時候，印度尼西亞人民才能獲得勝利。”

根据对印度尼西亞社会各階級的分析，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綱領弄清楚了革命中的眞正朋友和敌人。同样根据这一分析，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第五次全國代表大会决定使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担負起重要的任务：建立一切革命的民族力量即工人、農民、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統一战綫的任务。这一統一战綫必須建立在工農联盟的基礎上，它必須是最廣泛而且是羣众革命鬥爭的結果。这就是印度尼西亞人民建立一个人民政府，打敗革命敌人即帝國主义者、地主階級和買办資產階級的条件。

为了建立眞正的民族統一战綫，印度尼西亞共產党首要的任务是將農民吸引到民族統一战綫裏面來。關於这點，在向第五次全國代表大会所作的總報告中說道：

“……为了吸引農民，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人的最近的任务就是消滅封建主义殘餘……農民工作的第一步就是帮助他們为日常的需要及取得部分的要求而進行的鬥爭。这样就意味着組織和教育農民走上更高的鬥爭的階段。这就是建立作为强有力的民族統一战綫的基礎的工農联盟的依据。”

關於議会鬥爭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对韋洛坡政府及後來的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的支持，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綱領說道：

“印度尼西亞共產党認为它在議会中的工作不是党的主要工作，議会鬥爭也並不是唯一的鬥爭形式。”

但是，这並非意味着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忽視普选和議会鬥爭，同時並非意味着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对迄今为止的歷届政府或在人民民主政府組成前將要执政的政府採取同一的态度。

上述綱領說道："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政策是根据馬克思主义对於具体情况和力量对比的分析。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已經参加並將繼續最積極地参加議会鬥爭。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充分了解到它的政治責任，它以十分嚴肅的态度对待議会工作。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对过去的歷屆政府並不是採取一視同仁的态度。在一定情况下，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反对政府並号召羣众起來推翻它，在其他情况下，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支持政府，在其他情况下，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参加政府。"

議会鬥爭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对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約政府的支持也必須是为了擴大和加强民族統一战綫。

正如向第五次全國代表大会所作的總報告中所說的，建立統一战綫的任务是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第一个緊迫任务。

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第二个緊迫任务是繼續建設全國範圍的、廣大羣众性的、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完全鞏固的印度尼西亞共產党。

關於这點，代表大会要我們記取斯大林同志的話，如果我們要在革命中取得勝利，我們就必須有一个列寧型的革命党，或者如毛澤东同志所說的，列寧—斯大林型的党。

如果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沒有掌握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那末，那样的党就不可能建立起來。只有为先進理論所指導的党，才能起党的先鋒作用。只有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的党才能率領並引導工人階級和其他廣大的人民羣众。

代表大会也認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只有不断地与自己隊伍中的右的或"左"的机会主义者進行無情的鬥爭，才能完成它

的偉大的和嚴重的歷史任务。基於此，代表大会同意並支持一九五三年十月中央委員会会議關於陈鏻如主义的決議。代表大会製訂了關於陈鏻如主义的特别決議並作出結論說："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革命期間直到一九五一年年初，陈鏻如主义实际上已在党內佔統治地位。"代表大会確定：

"在思想方面，陈鏻如主义是主观主义，是党內的教条主义与經驗主义的傾向，它使党犯了右傾和'左'傾的錯誤，並大大地破坏了党和革命运動的發展。"

代表大会警告我們說，党如果得勝，切勿驕傲，党必須經常看到在工作中的缺點，党必須敢於承認其錯誤並公開地誠实地改正其錯誤。只有党不害怕批評和自我批評，只有党不掩蓋它在工作中的錯誤和缺點，只有党教育和鍛鍊它的幹部从党的工作的錯誤中吸取經驗教訓並且善於及時地改正錯誤，那末，党才是不可战勝的。

由於印度尼西亞是小資產階級的國家，这就是說，在这个國家裏，小私有者的企業仍然很多，因此小資產階級意識，即主观主义有它强固的社会基礎。因此代表大会規定，在党內反对主观主义对党是非常重要的。兩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經驗主义对党都同样是危險的，它們能使党实行右傾或"左傾"机会主义。只有当党教育党員利用馬克思列寧主义的方法來分析政治形势和估計階級力量，只有党引導党員去關心社会和經济情况的調查研究時，党才能反对主观主义。

为了把廣大劳動羣众团結在党的周圍，党必須引導其党員去關心同工人、農民和劳動知識分子的日常需要有關的細小和普通的实际工作。这种工作並不是称心如意和沒有困难的工作。但这就是密切党和羣众的联系，並使党不致再成为左傾口号的犧牲品的唯一道路。

以上就是党所决定的關於建党的主要點。这样一來，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的第二个緊迫任务也就清楚了。这意味着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已經从自己的經驗中学習建党，並使自己成为列寧—斯大林型的党。

關於統一战綫問題和印度尼西亞共產党自一九五一年以來的統一战綫工作，党代表大会已作出如下結論：

“……这是与民族資產階級的联合日益密切，但工農联盟尙未强固的時期。換言之，党仍然尙未具有强固的根基。在这一階段中，党必須大力地反对过高估計与民族資產階級的联合而过低估計工人階級的領導与过低估計工農联盟的右的偏向。这一危險是拋棄党的独立性的危險，是把自己与資產階級溶化在一起的危險。与此同時，党当然要大力地防止‘左’的偏向，防止宗派主义，即不重視和資產階級建立民族統一战綫，及不全力來維護統一战綫的政策的态度。由於買办資產階級集团投靠不同的帝國主义並由於目前党的政策首先是針对荷蘭帝國主义而不是針对一切外國帝國主义，因此，造成了帝國主义者本身間的日益尖銳的矛盾，这种矛盾自然也在他們的買办集团中間發生了。这一民族資產階級参加的統一战綫的建立，对於党的發展与建設，对於最近的党的工作，即建立反封建主义的工農联盟，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党的建設以及工農联盟的建立是無產階級对民族統一战綫的領導的保証。”

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第五次全國代表大会研究印度尼西亞共產党悠久的歷史，並以馬克思列寧主义为指針，在党內清算了一九五一年以前的時期的錯誤。由於这次代表大会的成功，党的黑暗的舊時期已經肯定地一去不復返了，而新的時期，始自一九五一年的時期正在欣欣向荣地發展着。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間，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中央委員会第二

次全体会議召開後，党關於更加擴大統一战綫的决定，發展了这个新時期。根据对印度尼西亞政治情况的分析，这次中央委員会会議指出，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已經成为朋友和敌人都不能忽視的重要的和偉大的民族力量。根据对印度尼西亞的歷史和政党情况的分析，中央委員会决定，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必須積極使印度尼西亞共產党同其他政党，特别同各民族主义政党和以回教为基礎的政党之間的合作。上述决議是这样論述这个問題的：

“对我們來說，共產党及其羣众和民族主义、回教政党及其羣众之間的合作，並不像民族主义和回教的領袖們經常所說的那样，只是某种限於將來普选結束時为止的合作。不管將來是誰獲得勝利，我們在普选以後也要進行合作。我們的这种願望是符合於我們共和國‘殊途同歸’（有區别，但又一致）的口号的。”

中央委員会其他重要的决定是關於集体領導的方法。集体領導“是从思想上組織上鞏固党、使党更具有战鬥性的以及密切党与羣众联系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有了这样的党，一切民族力量更廣泛的团結必將成为現实。”

以上所述的清楚地說明，三十五年來，建設党並使党布尔什維克的过程，是和党的政治路綫以及党在解决統一战綫問題上特别在处理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上是否正確有非常密切的關係。相反的，党愈益布尔什維克化，党的政治路綫就愈益正確，而且党在解决統一战綫問題上特别在处理党和民族資產階級的關係上也就愈益正確。

忠於它的英雄的和愛國的歷史，学習以印度尼西亞优秀兒女的犧牲換來的經驗，並以創造性的馬克思列寧主义为指針，印度尼西亞共產党繼續执行其歷史任务。在目前情况下，印度尼西

亞共產党不断地和尽力地为擴大和加强民族統一战綫而工作。此外,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也將不断地和尽力地繼續建党並使党布尔什維克化,作为民族統一战綫得以順利和成功的基本保証。

民族統一战綫万歲!

印度尼西亞共產党万歲!

創造性的和偉大的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学說万歲!